



豫东北地区龙山时代丘类遗址与城址出现原因初探



袁广阔

(首都师范大学)

豫东北鲁西地区存在大量的古代文化遗址,这些遗址因一般呈圆形土包状矗立在平原之上,当地居民多称之为“丘”、“垆堆”、“陵”、“岗”、“台”、“台岗”、“岗子”等,如濮阳的帝丘、菏泽的陶丘、安丘垆堆、杞县鹿台岗、鹿邑的栾台、青丰的苍吉陵等,这些丘类遗址多与黄河中下游发现的龙山城址交错分布,如河南境内有濮阳戚城、淮阳平粮台等,山东境内仅聊城地区就发现9座,其中经过科学发掘的有茌平教场铺、阳谷景阳岗龙山城址等。近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豫北焦作、新乡和濮阳等地区新石器时代的聚落遗址调查和发掘时,发现从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时期聚落的形成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比如丘类遗址是从龙山文化中期开始形成的,而这一变化和龙山文化城址的出现存在一定的关系,本文主要依据豫北地区特别是濮阳一带新的考古资料,对黄河中下游龙山城址出现的原因作一初步探讨,不当之处,敬请同行批评指正。

丘类遗址主要分布在河南省的东北部,濮阳古黄河以东的冀、豫、鲁、皖交界地区,这里地势较低,海拔多在40~50米之间,古代的河流湖泊众多,如著名的济水、瓠子河、马颊河、濮水等,湖泊有雷泽、菏泽、钜野泽等。该区域因是汉代以后黄河的泛滥区,因地势不同,古代遗址的保存和暴露情况不一,古黄河西南部地势较高的地方,丘类遗址保存的较好,如濮阳县发现的遗址多集中在县西南部,目前在西部地势相对较高的几个乡镇内发现10多处龙山遗址,而濮阳再向南的滑县境内,发现20多处龙山文化的丘类遗址,这些遗址都在今天的地表之上,面积不大,多在1万平方米左右,形状多为圆形,保存较高的有6~8米。而山东聊城、菏泽地区保存较高的丘类遗址也主要在其东部地势较高的地方。黄河河道经过的地区古文化遗址多被掩埋

在黄河泛滥的淤沙之下,遗址需经过考古钻探才可以发现,如濮阳帝丘遗址保存高达10米的东周城墙,还有3~4米掩埋在黄沙下,而当时的地面应在13米左右。山东菏泽的尧王庙等龙山遗址也是在2米多之下的淤沙下发现。目前经过考古发掘的典型丘类遗址濮阳有蒯聩台、马庄、金桥、戚城、程庄、丹朱等遗址,滑县有三义寨^①等,鹿邑栾台^②、永城王油坊^③、造律台^④、杞县鹿台岗等遗址^⑤;山东菏泽有安丘垆堆^⑥、尧王庙^⑦,梁山清垆堆^⑧、曹县莘冢集^⑨,聊城茌平县尚庄(岗子)等遗址^⑩,这些丘类遗址都是龙山时期在较高的地面而形成的。河南省境内目前调查出的丘类遗址一般是暴露在地表上的,濮阳市发现30余处^⑪,商丘市、周口都有较多发现,但具体数字不详。山东菏泽市地上和地下共发现112处^⑫。此外需要指出的是豫北黄河西岸海拔相对较高的新乡、辉县、淇县、安阳等地的龙山遗址也基本是以丘类遗址的形式存在的,如目前发掘的安阳后岗^⑬、汤阴白营^⑭、淇县王庄^⑮、新乡李大召遗址^⑯等,但这里龙山遗址的面积一般较大,高度没有黄泛区的高,高度一般只有2~3米,其形成的规律和豫东的丘类遗址也很相似,这一区域内,大的龙山文化遗址也为城址。

二

丘类遗址开始不断增高是由龙山时代开始的。考古资料表明在濮阳、菏泽地区部分遗址在仰韶或大汶口阶段有人类居住,而大多数遗址是由龙山文化开始居住的,但作为丘或垆堆不断增高的遗址是由龙山时代开始的,丘或垆堆遗址出现的时间均在庙底沟二期之后,即一般认为的龙山文化中期,而这一地区龙山城址的出现也是在同一时期,龙山城址出现之后,其文化层一般就分布于城内。

仰韶文化晚期到龙山文化聚落的变化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 遗址由地势低洼的地方向地势高的地方转移。濮阳西水坡遗址现在海拔高度为 50 米,遗址在今地表以下 2 米发现^②,而西水坡南部距离遗址仅有 600 米左右的西水坡南遗址,为一处龙山遗址^③,现在的海拔高度也为 50 米,龙山文化层就暴露现在地面上,遗址未破坏之前高于现在地面。西水坡遗址东北约 200 米,分布有马庄遗址,面积 1 万平方米,遗址为一圆形台地,高出现在地表 1~3 米,马庄周边地面海拔高度 50.1 米,加上遗址高度,遗址高约 53 米^④。这两处遗址下面均无仰韶文化遗存。在濮阳地区类似马庄遗址有云峰寺^⑤、瑕邱等遗址^⑥。这些龙山遗址的地势比西水坡高两米左右。很明显,西水坡遗址因为地势较低在龙山文化时期已经无人居住。

2. 地势较高的仰韶文化遗址在龙山文化时期变成丘类遗址。如铁丘遗址于原濮阳县西北约 2 公里处^⑦。遗址分布在铁丘村以东的一片台地上。台地高出地面约 3 米,遗址面积 5000 平方米左右。台地最高处,1965 年平整土地时被农民普遍铲去 1~1.5 米,古代文化层直接暴露在地面上。属河南龙山文化遗存。从地面现存的陶片来看,此处遗址的文化内涵包括仰韶、龙山和殷、周等不同时期的遗存。《春秋左氏传·哀公二年》:郑罕达帅师,郕无恤御简子,卫太子为右,登铁上,望见郑师,卫太子自投车下,即此处也。可见当时铁丘遗址是有相当的高度的。上述这些例子在濮阳、滑县、商丘、山东的菏泽等地普遍存在。

3. 面积大的遗址出现了城墙变成城址。比如位于濮阳市区南的戚城遗址,面积 15 万平方米,2006 年的考古发掘表明最早这是一处龙山城址,其面积和东周时期的戚城一致^⑧。在鲁西茌平教场铺龙山文化遗址发现的城墙平均宽度为 28 米,最宽处达到 30 米,保存下来的高度接近 2 米,用黄沙、黏土混合分块夯筑。根据钻探结果,城墙大体接近圆形,东西略长,面积在 5 万平方米左右^⑨。景阳岗城址位于鲁西北黄河冲积平原阳谷县张秋镇景阳岗村,西北距阳谷县城 17 公里,南距黄河约 4 公里。1994 年普探资料表明,该城址为东——西南向,城墙宽 20~25 米。城址平面略呈圆角长方形,长约 1150、宽 300 米。包括城墙在内,总面积 38 万平方米^⑩。

三

丘类遗址的形成,首先是选择地势高亢的台地,接着是居住的人们通过建筑房屋垫高地基、修

筑房屋周边的基础如散水、活动面以及倾倒垃圾等活动使遗址开始不断增高。而有意识地加高居住遗址在仰韶时期并没有开始。从田野考古资料分析,本地区仰韶文化时期的房基分地面式和半地穴式两类,平面形状为长方形或圆形,地面基础一般是铺垫一层较薄的白灰面或黄土面,地基没有明显加高。如西水坡遗址仰韶文化时期的房基多为半地穴式,房子中间有一灶,铺垫一层较薄的黄土面^⑪。孟庄遗址仰韶文化的房基厚度只有 10~15 厘米左右^⑫。而龙山文化时期已经发生了变化,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加高居住基础。豫北地区龙山文化的房基已经不见或少见半地穴房基,地面建筑的基础加高明显。如淇县王庄龙山文化房基的厚度是 40~50 厘米^⑬,安阳后岗遗址的龙山房基一般都在 50 厘米以上,有的更厚,如 F12 厚度约 80 厘米^⑭,濮阳蒯聩台、滑县三义寨遗址经考古发掘等都是如此。

这时期加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丘类遗址增高是在同一地点新房子利用旧房基多重修建。比如濮阳蒯聩台、滑县三义寨遗址、鹿邑栾台遗址都普遍存在。这里以资料发表的比较典型的后岗遗址为例说明,该遗址除去堆积较低之外,遗址的形成方法完全和豫东的遗址一样。安阳后岗遗址在约 600 平方米的范围内发现层层叠压的房基 39 座,均系单间,大多为圆形,个别近方形,面积不大,直径一般在 3.6~5 米之间。它们的形成都是铺垫很厚的地基,相对晚的房基直接建立在早期的房基之上。如探方 T17 内的最晚的 F12 直接在 F13 上建筑,而 F13 又直接是建在 F33 之上,F33 又是建在 F38 之上,仅这 4 座房基使遗址已经升高到 2.3 米,其周围的文化层也随着升高,类似的情形在后岗遗址的各个探方均如此。已经发掘的汤阴白营、淇县王庄、濮阳蒯聩台、滑县三义寨遗址内的房基的也是如此。

次之,丘类遗址增高还表现在同一座房屋修建十分频繁。考古发掘表明同一座房基的居住面多次修建,如安阳后岗的龙山房基共有 39 座,所有房址都有多层的白灰居住面(4~6 层)和多个柱洞重叠的现象,这些都是当时重复修建房屋所形成的。后岗 F12 为一圆形房基,室内共有五层白灰面,门外有四层路土面。后岗 F8 室内有 5 层居住面,2~4 层居住面的中央皆有一圆形灶面,室外有 5 层活动面,每层活动面下都有一层呈斜坡状的散水。室内外有 16 个柱洞,从所处的层位分析,其中柱 3、5、7、8、10、11,属第 1、2 层居住面,柱 4、9、13 属 3、4

层居住面 柱 6、12、14 属第 5 层居住面。汤阴白营遗址也如此,该遗址龙山文化的居住面一般分四层。永城王油坊遗址 F20,平面为正方形,室内居住面多达 7 层。

后岗龙山遗址的房基一般叠压在 5~6 座,如 F10-F14-F17-F22-F27-F28,如果每座以六层居住面计算,后岗龙山文化的房子具有明显翻修和重建的次数为 36 次,实际上当时修建的次数要高于这个数字,因为维修房子不一定要修建居住面,这仅仅是用明显的居住面的重新铺垫计算的。因此我们认为丘类遗址就是因为房基的维修和重建不断加高而形成的。前面我们举的例子都是面积小的遗址,而它们的形成就是不断地增加居住面的高度,倾倒生活垃圾等使遗址成为高高的丘或垆堆。目前从我们调查的资料分析,这些丘类遗址的面积都较小,一般在 5000~1 万平方米之间。滑县有 28 处,现在的海拔高度在 53~55 米间,濮阳 22 处,海拔在 50~52 米间。因此滑县的丘类遗址今天仍然明显,而濮阳的遗址多数只是留顶部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就淹没在黄河故道下了。

关于这些丘类遗址的形成原因,我们认为是当时水患太多造成的,一方面是人们居住环境的水位上升,人们需要增加居住地的高度来适应水位的变化。另一方面是雨水太多,房屋经常倒塌,需要不断维修,房屋的居住面才会有不断修补的现象。这种用抬高居住面的办法,来避免洪水的侵袭,不仅古代有之,在该地区一直保存到今天,笔者 2005 年在黄河沿岸从事考古调查时,在河南范县境内,黄河大堤内侧居住的村民都居住在一个个近方形的高台子上,台子高度和大堤差不多,在 6~8 米之间。与古代不同的是台子的周围多用石头包裹,每个台子都有一条和台子一样高的道路与黄河大堤相通。20 世纪 50 年代,在山东梁山、东平县修建的确保黄河安全的东平湖蓄洪区内,当地政府视村庄人口多寡、地势高低,筑起一个个面积不等,而高约 5~6 米的土垆堆,作为村台,供全村人建房居住,以避免蓄洪时洪水的侵害。由此可知,古今黄河泛滥区内的居民用抬高居住面以躲避洪水的办法是一致的^⑩。

四

既然我们知道豫东地区丘类遗址的出现和形成是雨水的增多,水位的上升,人类为适应环境而采取的措施。丘类遗址的面积小,水位高时地面加

高相对容易,而面积大的遗址用此办法就不易很快奏效,最可行的办法是在遗址周围筑坝,也就是我们说的城墙。目前这里发现城址的面积均在五万平方米以上,如濮阳戚城约 15 万平方米,淮阳平粮台和荏平教场铺面积均在 5 万平方米左右。从已经知道考古资料分析,这些城址的防水患功能很强。一是城址都选在地势较高的台地之上。戚城龙山城址是位于黄河东岸一块高地之上,濮阳地区自汉代以来黄河多次决口,但城址至今保存完好。景阳岗城址是选在高于周边 10 余米的台地上的。孟庄龙山城址与其早期的裴李岗、仰韶文化遗址比较,它明显又向北部高地移动了一段距离。二是这些城墙都不设基础槽,为内外挖沟取土,内外两侧堆土筑,平地起建而成,墙体都比较宽厚,与后来的堤坝特征接近。荏平教场铺龙山城墙平均宽度为 28 米,最宽处达到 30 米。景阳岗城址城墙宽 20~25 米。辉县孟庄的宽度也为 20 米左右^⑪。淮阳平粮台的城墙宽在 13.5 米^⑫,河南北部发现的龙山城址如温县徐堡^⑬、博爱西金城^⑭也是如此。三是墙内外坡度都比较缓,一般坡度都在 50 度以下,城墙外侧都是经过多次修补,大水过后淤土明显,辉县孟庄北城墙壕沟仅向下发掘 3 米,城墙外侧修补的附加夯土已达 2 米多宽。平粮台城墙壕沟向下发掘不足 3 米,城墙外侧修补的附加夯土已达 8 米多宽,这些在城墙外侧不断的修补,说明当时城墙的冲刷和垮塌比较严重。四是孟庄龙山城址发现洪水冲毁城墙的证据。在孟庄龙山城址的西墙中段有一个大的缺口,已探出部分 15 米宽,考古发掘资料表明这部分龙山城墙是被洪水冲毁的。基于上述原因,我们认为这些城址的主要功能当是用来防水患。

五

从考古资料分析,龙山文化时期丘类遗址和城址的出现是当时气候变暖,雨水增多,河湖泛滥,水位上升,人类为适应环境而采取的措施。这一认识和一些气象学家的研究成果一致。气象学研究表明,中原地区在距今 5000~4000 年前,正是降雨量多的时期^⑮。

近年来随着环境考古学的开展和深入研究,人们对龙山时期的气候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如登封王城岗遗址近来的孢粉分析,当时的中原具有亚热带气候特点,龙山时期亚热带北界比现在偏北^⑯。在山东地区,环境学者根据对山东两城镇遗址出土木炭和灰坑中的植硅体分析,分析两城镇遗址内保存

比较多的竹子遗存,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在龙山时期山东一带也具有亚热带气候特点^⑪。

考古资料表明丘或垆堆遗址出现的时间均在龙山文化中期,而这与丘类遗址同处一个地区的龙山城址出现也是在同一时期,龙山城址出现之后,其文化层一般就分布于城内。河南境内除豫东北发现较多的龙山城址外,在淮河中上游地区也有成组发现,如登封王城岗^⑫、平顶山蒲城店^⑬、郾城郝家台等^⑭,这些城址除王城岗的面积大一点之外,其余诸城址的特征和豫东北的城址差别不大,比如城墙都比较宽,都不设基础槽,为平地起建而成,建筑年代也比较接近,它们都是处在两条河流交汇的台地上,其防水的功能也十分显著,因此我们认为中原、山东一带龙山城址突然出现在一个时期,主要原因是水患过多,城墙是当时为抵御洪水的一种主要措施。

注释:

①、②① 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

②②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河南濮阳高城遗址的发掘简报》,《考古》2008年第3期。

②③ 山东省考古研究所菏泽2008尧王庙遗址发掘资料。

②④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濮阳蒯聩台发掘资料。

a. 北京大学考古系:《豫东北考古调查与试掘》,《考古》1995年第12期。b. 张相梅:《濮阳市文物保护单位通览》,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4年。

濮阳市文物保护单位金桥遗址发掘资料。

戚城文景区管理处:《濮阳戚城遗址龙山文化灰坑清理简报》,《中原文物》2007年第5期。

②⑤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平陆程庄遗址发掘资料。

②⑥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范县丹朱遗址发掘资料。

②⑦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滑县三义寨遗址发掘资料。

②⑧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鹿邑栾台遗址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89年第1期。

②⑨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永成王油坊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5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②⑩ 李景聃:《豫东商丘永成调查及造律台、黑孤堆、曹桥三处小发掘》,《中国考古学报》(第2册),商务印书馆,1947年。

②⑪ 郑州大学考古专业:《河南杞县鹿台岗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4年第8期。

②⑫ 北京大学考古系商周组:《菏泽安丘垆堆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第11期。

②⑬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山东梁山青垆堆发掘简报》,《考古》1962年第1期。

②⑭ 菏泽地区文物工作队:《山东曹县莘冢集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80年第5期。

②⑮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茌平尚庄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5年第4期。

②⑯、②⑰ 鄧田夫,张启龙:《菏泽地区的垆堆遗存》,《考古》1987年第11期。

②⑱、②⑲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79年安阳后岗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5年第1期。

②⑳ 河南省安阳地区文管会:《汤阴白营河南龙山文化村落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3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㉑、㉒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淇县王庄龙山文化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9年第5期。

㉓ 郑州大学考古系:《新乡李大召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6年。

㉔ a.濮阳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3期。b.濮阳西水坡遗址考古队:《1988年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9年第12期。

㉕ 张相梅:《濮阳市文物保护单位通览》,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4年。

㉖ 北京大学考古系:《豫东北考古调查与试掘》,《考古》1995年第12期。

㉗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06濮阳考古调查资料。

㉘、㉙ 马连成、廖永民:《濮阳市郊区考古调查简报》,《中原文物》1986年第4期。

㉚ 濮阳戚城景区保管处:《戚城发现一座龙山灰坑》,《中原文物》2007年第6期。

㉛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鲁西发现两组八座龙山文化城址》,《中国文物报》1995年1月22日第3版。

㉜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山东阳谷县景阳冈龙山文化城址调查与试掘》,《考古》1977年第5期。

㉝ 濮阳西水坡遗址考古队:《1988年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9年第12期。

㉞、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辉县孟庄》,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

㊱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试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3期。

㊲ 郑州大学考古系2008年温县徐堡遗址发掘资料。

㊳ 山东大学考古系2008年沁阳西金城遗址发掘资料。

㊴ 王芑:《中原地区历史旱涝气候研究和预测》,气象出版社,1992年。

㊵、㊶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登封王城岗考古发现与研究》,大象出版社,2007年。

㊷ 靳桂云、栾丰实等:《山东两城镇遗址土壤样品的植硅体研究》,《考古》2004年第9期。

㊸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平顶山蒲城店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8期。

㊹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郾城郝家台遗址的发掘》,《华夏考古》1992年第3期。



史前文化

本期导读

本栏目此次刊发的3篇文章来自三个不同的新石器考古学文化区和三种不同的研究取向。其中《崧泽文化陶器编织纹研究》一文,以植物编织技术为参照,对崧泽文化器物上大量的刻划及彩绘编织纹样进行了详尽的解析和分类,对崧泽编织纹样的起源和发展进行了梳理,进而就编织纹样的社会意义以及与周边文化的相互联系做了深入的探讨。此文虽未脱离传统文化史研究的套路,但以植物手工编织技术解析陶器纹样,并试图寻求这些纹样在崧泽文化中变化发展的内在逻辑则是在“纹样学”研究中的一次可贵尝试。从编织纹样看崧泽文化的社会以及崧泽文化与周边文化的关系也是新潮的研究视角,从而均可以进一步导向所谓“认知考古学”的领域,同时也从另一侧面对我们理解崧泽文化的内涵作出了积极贡献。

《豫东北地区龙山时代丘类遗址与城址出现原因初探》一文对分布在与东北和鲁西地区的“垆堆”类遗址的形成原因进行了探讨,从这类遗址堆积物特别是房屋、城墙等遗迹的堆积形成过程的分析和讨论中推定,这类不断增高的遗址的形成是由于仰韶文化晚期以来聚落中房屋在同一位置的不断改建和增建所造成的,而大一些的遗址则还在同时期建有城墙。如果与当时气候变迁的情况一并考虑,其原因则应当是龙山时期气候一度变暖,雨量增多,河流泛滥频仍密切相关的。而大型遗址中城墙的建设集中出现在同一时期正应当是为了抵御水患的一个主要措施。实际上,中国古代遗址特别是古代农业发达地区的遗址都有类似的特点,就是有历代聚落居住在同一地点,由不断的建设而形成高起的遗址。只是豫东北和鲁西南地区这一现象特别突出,有些遗址高达10数米,有些则深埋于当今的地表之下。如著名的濮阳西水坡遗址就有后岗一期、龙山、周代和唐代以后等不同时期的遗址与黄河冲淤积土层层叠压的情况。本文结合遗址堆积物形成的文化原因和自然原因两个方面,对这一地区的遗址形成过程进行考察,给我们带来了合理解释的研究个案。其中对于龙山城址出现原因的探讨尤有新意,对认识中原地区龙山时代的社会与环境的关系也将带来新的视角。

《钱塘江史前文明史纲要》则是一篇探讨区域史前文化变化发展的纲要式文献。由于钱塘江流域史前文化的不断发现,特别是近年来上山、跨湖桥以及河姆渡、崧泽-良渚等时期遗址的不断发现和发掘,本地区已经初步建立起了完整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序列,其完整程度甚至超过了一些经过长期考古工作的大河流域,因此特别令学界瞩目。本文作者是建立这一文化序列的主将,当然最有资格讨论这一地区史前文化的变化发展。不过作者气魄宏大,并没有仅仅局限在本地区的史前文化现象上,而是在更广阔的空间和时间维度上对这一地区不同时期的文化发展进行观照。而本文的论题更是涉及了农业起源、农业发展、原始宗教、区域文化格局以及聚落与社会等多个方面,所见均有新意,对相关领域的研究当有助益。当然,如此广阔的视野和众多的论题显然不是这样一篇短短的文章所能展开的,相信这一“论纲”当是作者长期工作、构思和不断完善长篇著作的提要。

(张弛)